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的辉格解释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历史的辉格解释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

张岳明 刘北成 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绪论	3
第二章 基本预设	9
第三章 历史的进程	23
第四章 历史与价值判断	39
第五章 历史学家的技艺	54
第六章 历史学中的道德判断	64

序 言

这项研究要探讨的是我认为公认意义上的“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项研究至少要覆盖通常所理解的这个说法的全部含义,甚至可能还要赋予它某种引申的意义。我要探讨的是一种许多历史学家都具有的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一边撰写历史,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这种历史进程的辉格版本是与某些历史编纂、推论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只要不是历史研究,所有的历史讲述就都可能陷入此类谬误。对于这样一种情况的考察,会引申出许多问题,涉及历史研究和所谓通史之间的关系,涉及某种历史变革的性质和所谓历史进程的性质,同时也会涉及历史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局限。在这里,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辉格派历史学家非要从历史研究中获得其本身不能提供的结论的企图。

我并不想把本书的主题当成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我宁愿把它归结为历史学家心理层面的问题。对于当今的观察者和历史学家来说,诸如“局势”和“偶然事件”等词汇已经被用于描述看来如此的现象上。但是,我的这项研究不会涉及对这些词汇的哲学

描述和分析。不论哲学家们对这些词汇做出了解释还是消解,这项研究的论题仍然不会受到他们的任何影响。

H. 巴特菲尔德

1931 年 9 月

第一章 绪论

人们常说历史学家是一位复仇者。他作为法官站在过去世代的党派、纷争及事业追求之间,为失败者兴灭继绝,并打压成功者的自傲。通过他对历史的揭露与裁定,他的冷嘲热讽或道德义愤,他可以惩罚不义、补偿冤屈、奖励清白。让我们试想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他并没有对用善与恶、进步与反动、黑与白来划分人类显示出太大的兴趣的话,他是可以被原谅的;况且,我们很难说道德上的义愤不会对扰乱一个人的判断火上加油。然而,如果这位历史学家不论个性还是私下里有他的好恶,而且仅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有极大的热情参与他所描写的游戏,这也可非议。人们甚至会乐于看到他以情绪化的笔触将自己的偏见传达出来,因为这样的话会使他的著作读起来增色不少,饶有兴味,条件是当他以这种方式迈入这个舞台时,他承认自己是在进入一个充满偏见²和纯粹偏好的世界,并且他不想以权威的口气(ex cathedra)说话。但是如果这位历史学家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是神或者是法官,是过去一切罪恶的当然复仇者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对他提出一种要求,要求他要更加像一个神明一样,把自己当作一名调解人,而不是复仇者;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尽可能地理解一切过往的人、党派和事业追求,如果这样的理解有臻于完善的可能,那么最终将能让一切协调起来。人们好像总是假定,他们从历史中可以获得的,不只是

某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观点,此外还有“历史的裁定”;所谓非个人化的历史本身会向他们说话。人们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每个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不是对他个人好恶和突发奇想的表达,全体历史学家是在尽可能地探求真理,或许通过把他们各自对真理的不完全表达结合起来,假如我们能够完全地获得真理的话,那将是历史自身的声音。但是,如果历史在这一方面就像是人类的记忆,所再现的是纠结于过去的人类的精神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想象,历史学的工作不是强调历史上的种种对抗,也不是为旧日政党的呼喊正名,而是找到差异之下的统一,并且把所有的生命都看作是生活之网的一部分。对历史怀有这种理解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力图使自己更像一个神灵,但却总比那些把自己想象成为复仇女神的历史学家要少一些愚蠢。这样的一位历史学家,如果他在研究昔日的争论,那么至少他会寻找对于纷争各方的理解,并且他必须希望自己要比那些当事人更好地理解他们。在观察那些身陷时代和情势之网的人们时,他可以对他们心生怜悯——而那些当事人是不会彼此同情的。尽管他不可能完美,但是没有理由不让他把那些争论和那时的人们带入到一个事事皆被理解、罪愆皆被宽恕的世界中来。

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清教徒、持有进步观念的辉格党人^①,一位 19 世纪绅士的典型代表,

① 辉格党(whig),英国政党。1679 年,在具有天主教背景的詹姆斯二世能否即王位的问题上,一部分议员持反对意见,被政敌讥为“辉格”(whig),似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派”(whiggamores)的简称,他们也逐渐以此自称。1688 年光荣革命后,辉格党人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该党于 1714 年之后长期支配英国政治,主张有限君主制,强调议会的重要性。到 18 世纪末期辉格党势力逐渐衰退。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一段时期,该党在政治上失势,1830 年重新掌权。19 世纪中叶,辉格党势力大增,并更名为自由党。一般地,具有辉格倾向的人也可被称为辉格派。

* 本书的注释皆为译者所加。

这的确是令人惊讶的。在他成为一个决定论者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保留了他所扮演的神明的角色,发布各种道德判断,并且如同加尔文的信徒一样不会因为道德义愤而放弃自己的任何权利。尽管他本人对当代的政治运动不报任何同情,但他骨子里面的某些东西仍然让他倾向于对历史进行辉格式的解释,从而拒绝对那些面对社会革新时与他持有相同态度的人^①怀有一种历史性的同情。典型的例子就是哈勒姆^②,他苦苦地反对 1832 年大改革法案,并且一想到这个国家将要以革命的方式变革就颤栗不已。有人会争辩说,我们头脑中的一般历史图景都不免被刻上了那些历史著作大师的印记,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辉格派人士和绅士,后来还有一些美国人。也许就是从他们那里,我们的教科书历史学家继承了辉格派的高顶礼帽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当然也顺便继承了他们出于安慰的缘故而对一些反动分子施与的慷慨,他们会说,“尽管那人是个反动派,但他的私人生活还是无可指摘的”。但是,⁵不管我们选取的是马丁·路德^③与教皇的对抗,还是菲利普二世^④与伊丽莎白女王^⑤之间的齟齬,抑或是胡格诺宗^⑥与卡特琳·德·

① 这里指托利党人。

② 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 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辉格党人。

③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16 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新教路德宗奠基人。

④ 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1556 至 1598 年在位。

⑤ 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 I, 1533—1603),亨利八世之女,1558 年即英格兰和爱尔兰王位。

⑥ 胡格诺宗,16 到 17 世纪法国新教徒的一个派别,1559 年巴黎会议后信奉加尔文宗。

美第奇^①之间的斗争；不论我们考察的是查理一世^②与议会的对抗，还是小威廉·皮特^③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④的争执，历史学家往往会先在地接受辉格派或新教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马上就忙于将世界分为进步的朋友和进步的敌人两大阵营。诚然，这样一种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因职业史学家们越来越专注的专题研究而有所修正，但是，很显然，在上述的例子和许多其他的例子中，也需要用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对公认的辉格解释或新教解释做出实质上的修正。此外，这种辉格倾向极其根深蒂固，即使个案研究修正了故事的细节，我们根据这些成果对整体图景的价值重估和对历史轮廓的重新编纂却仍然进展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罗米耶^⑤先生对那些研究胡格诺派的史学家所哀叹的东西

6 同样适用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那就是，有一种把新近的研究补缀在古老的故事里的倾向，即使具体的研究已经改变了整个问题的方向。我们总是执著于其实相当于辉格派历史解释的那样一种历史知识编纂，而我们对研究的尊重也不过是让我们承认，那种历史解释需要在细节上加以验证。然而，例外的细节却并不妨碍我们一直按照同样的方式勾勒宏大的历史构图；而且这些例外最终都

① 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 1519—1589)，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1547—1559)，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的母亲，法国的摄政(1560—1574)。

②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1625年即位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

③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托利党人，两度担任英国首相(1783—1801, 1804—1806)。

④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 J. Fox, 1749—1800)，辉格党政治家。

⑤ 卢西安·罗米耶(Lucien Romier, 1885—1944)，法国历史学家。

在历史知识的编纂和概说^①过程之中消失了,而我们也获得了我们的通史概观。因此,在考察重大历史时期,论及欧洲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时候,辉格派历史观的统治最坚挺,也最长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职业史学家和所谓通史写作者之间重大差异所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所有的历史都有转变为辉格式历史的倾向。而且,这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传统解释的大行其道和持续影响。这就好像有一块磁石,除非我们能找到抵制它的方式,它会永远拉扯着我们的思想。可以说,如果我们仅仅具有诚实的态度,却没有审慎的自我批判意识,我们就会很容易地陷入到一种最基本的谬误之中。尽管这样的谬见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职业历史学家的具体工作,但是一旦某个题目离开了研究者之手,这种谬见就会浮出水面并有与日俱增的效力。因为我们越是高谈阔论而不是深究细问,我们就越会用论断去取代研究。如果我们没有严厉地压制我们最初的谬误,我们的历史就会变得越来越“辉格”。诚然,事实上,只要变得更概略,所有的历史必然会成比例地变得更加辉格。此外,不能说偏见所造成的错误可以用相反的偏见写成的著作来平衡;因为仅仅把控方的说法和辩方的说法放在一起,我们并不能得到真实的历史。因此,尽管有托利党人^②——正如有许多天主教

① 概说是本书的一个常用词,原文是 abridge(动词)、abridgment(名词),意为节略、剪裁、缩写、简编。为了保持该词在本书中的稳定性,一般译成“概说”。

② 托利党(Tory),该词来源于爱尔兰盖尔语 Toraighe,意为“被追捕的”,1639 到 1651 年英国内战期间指游击战者。1679 年,在詹姆士二世即位的问题上,持赞成观点的被政敌称为托利党人。1688 年后的君宪体制两党均有参加,但辉格、托利两党均有坚决主张共和制和主张詹姆士二世当国王的极端派。19 世纪中叶该党演化为英国保守党。

徒——写就的历史,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潮流转向这个方向。他们具有同样的根本性的无意识谬见,也就不可能偷偷地占上便宜。因此,人们很容易确信,历史女神克丽奥^①站在了辉格派一边。

① 古希腊神话缪斯九神之一,掌管历史。

第二章 基本预设

9

所有试图理解历史人物的努力,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最初的预设之上,那就是相信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与我们不同的心灵世界之中。如果这个信念是不成立的,那么人们肯定就会永远彼此隔绝,所有的世代就只能被视为生活在自成一体的世界和法则里。比如说,如果我们通过任何方式都没法理解今天的一个罗马天主教牧师,也无法理解在海德公园里演讲的无神论者,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就没法理解那些更加陌生的16世纪的人们,更谈不上理解把我们融入今天的历史塑造过程了。实际上,历史学家会如此假定:我们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直是同一个世界;同样地,即便是最不相同的人,也不会完全不同。举个例子说,尽管托马斯·阿奎那^①书中的一句话也许会让现代人觉得怪异,以至于人们想当然地把他看作是一个傻瓜或者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异类,我仍然认为,这样草率地打发一个人将阻碍我们去理解他的思想,甚至是妨碍我们认识人性和人性历史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将拒绝做出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性理解

^①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

的努力。恰恰是由于阿奎那与我们不同,他对于我们的历史想象来说才更加迷人。这是因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他的主要职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成为当代和过往世代的中介人(mediator)。至于说强调和突出各个时代之间的相似性,这就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了。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想要在过去中找到现在的话,那么他只是在跟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误解。他还不如将他的工作着眼于打破人们心目中假想存在的那些相似性呢。比如说,当他告诉我们,《大宪章》是一份封建时代带有封建性的文献,具有与我们想当然的理解完全不同的含义时,他正是在打破我们以为古代某种东西与今天某种东西极其相似的幻觉。整体来看,许多领域开展的专业研究,通过将事件还原到历史语境中的方式,发现了它们与今天世界的不同,修正了此前公认的辉格式历史解释,并更新了我们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时期的理解。

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有人觉得这样的解释若经过了仔细推敲就可能不易反驳,或者有人觉得这样的历史解释似乎不可避免,但这种解释对于理解历史仍然是一种障碍,因为人们一直据此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直接并永远参照“现在”。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可以据此进行选择、拒绝或强调。依据这样的参照系,历史学家必然会认为他的工作要求他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关注相异之处。从而,他会很容易地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他会想象自己发现了 20 世纪在历史上的“根源”或“预兆”,其实他身处的现实世

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他只是碰巧发现了会导致人们误解的表面相似。基于这同样的参照系,辉格派的历史学家们会画出一些串联特定历史事件的线索,例如,有的线索可以经由马丁·路德以及一长串的辉格派,最终达到当代的自由。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谨慎,他就会忘记了那条线索仅仅是他头脑中的一个把戏,他会逐渐地认为这一线索正是类似于“因果链条”的东西。这种方法的全部结果,将是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整个历史必然美好地汇聚到今日的通史图式。所有的一切都显示了数个世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是进步原则永远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党人则永远对这一原则产生阻碍。这个结果有一个漫画的形象,那是一种迄今仍未消除的流行看法: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处在权威之下噤若寒蝉,文艺复兴是对它的反弹,而宗教改革则是一次伟大的反抗。在这一点上,最鲜活的例子莫过于在街角谴责罗马天主教的人,他会说:“教皇统治英国的时期被称作黑暗时代。”¹³

辉格派的历史学家站在 20 世纪的顶峰,并且从他所处时代的观点来组织历史图式。同时,他还小心地防止跌落下来,利用各种貌似有理的论点让自己稳稳地立于山巅。他会说,随着时光流逝,我们看到的事件会表现出各自应有的重要性;他会说,我们往往根据最终的结果来判断事件,由于我们没法看得更远,所以我们至少应该追踪到今天;他还会说,只有与 20 世纪有关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在这个所有的学术讨论都像¹⁴在市场上叫卖一样、哲学被常识请下了神坛的时代,他可以运用任

何唾手可得的论点。要想证明辉格派历史学家从自己的山巅上所看到的历史乃是被颠倒和曲解的历史,是很难的事。事实上,此种解释的谬误在于,如果一个研究 16 世纪的历史学家满脑子都是 20 世纪的话,他会忽略所有中间世代,而在路德或教皇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之间直接做出推论。这样直接把历史和现实放在一起,即便会使一切变得简单、使一些论断变得格外耀眼,但仍然会导致事件之间的关联过于简单化,导致对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产生完完全全的误解。

诚然,在职业史学家进行专门研究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会采取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实际上,当我们走近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口头上接受了那些原则,我们也难以自始至终地遵循
15 它们。不管我们有什么意愿,也不管我们有什么理论,我们都会忘记我们是为了现在而开始研究过去的;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一头扎进过去,沉浸于过去,只考虑过去本身。很快,我们就会关注于那些世界上最无价值的事物,诸如玛丽·安托瓦内特^①的耳环或者詹姆士二世的追随者们^②的冒险经历。但是,当我们要设想历史的总体进程或者对之加以评论的时候,当职业史学家想要将他的细致之作与更宏大的历史故事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或史学家就会陷入辉格派的历史态度之中。换言之,这是当我们想要以宏观的角度处理历史的时候,往往会陷于这种错误的推论和这种未经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法国王后,路易十六之妻,1793 年被处死。

② 詹姆士二世的追随者们(Jacobites),光荣革命后仍然拥戴已被废黜的詹姆士二世的人。

检视的思维习惯。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职业历史学家的作品和通史作家的半是编纂、半是概说的作品之间。当我们的视角从对一个时期的微观考察转变为对历史的整体鸟瞰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与学者们应该讲述的故事判然有异的辉格派历史解释也随之而来了。

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还可能依据另外一种预设。当他在¹⁶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时,多多少少能够有意识地根据这种预设进行研究,并且自觉地作为他思想的指导。在这样的预设下,历史学家会意识到,他正在努力从过去的角度来理解过去。尽管他确实从来不可能完全从他那个时代中抽身而出,但可以肯定,这种对自身工作的理解与辉格派的历史学家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告诉自己,他是为了现实而研究过去。真正的历史理解与其说是通过使过去从属于现在而达成的,不如说是通过把过去变成我们的现在或者通过另一个时代的眼睛去看生活来完成的。不能假设,我们的时代是绝对的,而路德和加尔文的时代是相对的。只有完全接受如下¹⁷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同样正当,他们的事情和我们的事情一样重要,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活力,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对历史的理解。由于²⁰世纪有自己的各种事情要梳理,人们也许会对阿里乌斯和阿塔纳修斯关于一个双元音^①

① 该争论是4世纪基督教世界关于圣子耶稣的性质的争论。阿里乌斯认为圣子与圣父的关系是相似而不同一,是 homoiousios(ἁμοιούσιος),而阿塔纳修斯则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同一的,是 homoousios(ὁμοούσιος)。这两个描述耶稣性质的词区别仅在于一个双元音。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后,阿塔纳修斯的信条成为正统。吉本在《基督教历史》中评论说:“整个世界因一个双元音而四分五裂。”

(diphthong)的激烈争论不屑一顾,但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不能看到该争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头等大事的话,他就不会获得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性理解,他的心灵也没法得到安宁。只有当历史学家着重以这样的方式努力理解过去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他在何种程度上是在做阐明“古今之变”的工作。这样的历史学家,不会因为历史上的事物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另类的或邪恶的,就怀着道德义愤弃之不顾。相反地,他会努力将历史上的事物放入那个天然的背景之中,并且会通过展示它们与其他那些我们能够理解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对之做出解释和说明。当一位一只眼睛盯着当代的人问了一个类似于“宗教自由何以兴起”的
18 问题时,当辉格派的历史学家会巧妙地运用他的同情把问题转化为“对于今日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应该感谢谁”时,研究 16 世纪的职业历史学家将会更倾向于追问“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们会遭受到宗教迫害”。正是在这种专业的意义上,历史学家所提出的是关于过去的问题,而不是关于现在的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正是历史学家的职分,也是他力所能及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历史学家力图找到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所以他总是在宽恕罪过。那些我们认为无法理解的事,恰恰是历史学家们要做出解释的对象。于是,在他展示了为什么 16 世纪会出现宗教迫害之前,人们可以怀疑他是否有能力进一步探讨宗教自由如何降临到 20 世纪这一问题。

但是,在做出了理解过去的努力之后,历史学家将着手研究过
19 去发生的变化,研究变革发生的方式,检视世界上事件发展的路径。如果把所有职业史学家的工作放在一起并且考察他们的整体